
战后日本社会运动的演进和特征

胡 澎

内容提要：战后 70 年日本涌现出诸多内容、形式、特征各异的社会运动，如和平运动、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反公害运动、消费者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居民运动、妇女运动、信息公开运动、社区营造运动等。这些社会运动在与政府的关系上基本可分为“对抗型”、“要求型”与“建设型”三种。具有以下特征：运动的主体是“新中间阶层”，与社会问题密切相关，互联网的作用日益增强等。值得注意的是，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社会生活领域中的社会运动呈现出由“对抗型”转向“建设型”的趋势，而思想意识领域的社会运动则呈现出民族保守主义与和平民主主义两大势力的激烈交锋。

关键词：日本社会 社会运动 社会问题 新中间阶层

作者简介：胡澎，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K3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874 (2015) 05-0098-22

日本自 1945 年战败至今，已过去了整整 70 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伴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以及国内政治、经济的变迁，日本社会出现了劳动问题、公害问题、食品安全问题、大量生产和大量消费问题、城市化进程中的大拆大建问题、少子老龄化问题、教科书问题、修宪问题等。这些社会问题的出现，总是伴随着各种大大小小的社会运动。因此，战后 70 年日本社会也是反战和平运动、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反公害运动、消费者运动、居民运动、妇女运动、信息公开运动、生活者运动等社会运动绵延不绝、此消彼长的 70 年。

战后以来的日本社会运动领域宽泛、体系复杂，涉及政治外交、社会生活、思想意识、国家战略、社会治理等诸多方面。从社会运动这一视角，可窥探战后日本社会的整体运行轨迹及特征。

一 战后日本社会运动的主要发展阶段

日本在“社会运动”这一词汇之外，还经常会使用“市民运动”、“居民运动”、“新社会运动”等。在对日本战后社会运动进行研究之前，有必要对以上概念予以界定。

社会运动 (social movement) 是指有组织的一群人，有意识有计划地改变或重建社会秩序的集体行为，用意则在促进或抗拒社会变迁。赵鼎新为“社会运动”所下的定义是：“有许多个体参加、高度组织化、寻求或反对特定社会变革的体制外政治行为。”^① 日本社会学家盐原勉将“社会运动”定义为：直面因某种社会矛盾产生的生活危机的人们，试图以组织的或集体的形式，通过变革社会既有的资源分配状态、社会规范或价值体系，进而谋求通过重塑价值观来解决危机的努力。^② “市民运动”是指那些对超越某一具体地域社会问题持有关心的人们，为了某种理想、信念或要求而发起的集体行动。如 20 世纪 50 年代的反对氢弹试验运动、60 年代的安保斗争以及反对越战运动。“居民运动”是在某一地域凭借人与人之间结成的集团，超越阶级或职业的差异，以解决共同的地域生活的困难为目标的运动。具体表现为一定地域的居民为了共同的要求和问题解决，对政府、自治体、企业等进行的交涉等集体行动，其主体是城乡居民。日本居民运动产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对公害问题的应对过程。公害受害方的地区民众结成组织，针对企业和政府开展了要求赔偿和捍卫权利运动。“市民运动”与“居民运动”是涵盖在“社会运动”的范畴之中的。

60 年代后期以来，西方诸如废除歧视运动、女权主义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居民运动、反核运动、消费者运动、和平运动、地方分权运动等社会运动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表现在身份政治化、非组织化、非经济化、斗争对象非具体化等方面。为了与以往的社会运动相区别，被冠之以“新社会运动”。许多观察家和学者认为，“新社会运动是现代社会晚期的独特产物，在方法、动机以及方向上大大不同于以前的集体行动”，“新社会运动的发展反映了人类社会面临的不断变化中的风险。因为传统政治机构越来越不能应对

① 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第 2 页。

② 見田宗介、栗原彬、田中義久編『社会学事典』、東京：弘文堂、1988 年、第 390 頁。

所面临的挑战”。^① 新社会运动主要是由众多的非政府组织（NGO）或非营利组织（NPO）联合推动的运动，表现了人们对社会问题的意识和关心呈现个性化、多样化等特征。

本文在论述过程中使用“社会运动”，在强调居民主体时使用“居民运动”，在强调市民主体时使用“市民运动”，在强调 20 世纪 70~80 年代以后社会运动出现的变化与特征时使用“新社会运动”。

为对战后 70 年的日本社会运动分阶段予以梳理，本文借用战后经济史的划分周期，将战后历史分为经济复兴期、经济高速增长期、经济稳定增长期、经济长期低迷期。在这四个时期，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不尽相同，社会运动也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征。

（一）战后经济复兴期的社会运动（1945~1955）

1945 年日本战败投降时，经济已濒于破产地步，失业者大量增加、粮食匮乏、生活困难、通货膨胀严重。这一时期社会运动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捍卫生活权。如 1946 年全日本出现了要求揭发藏匿物资并予以合理分配的运动。5 月 19 日，25 万东京市民参加了“争取大米人民大会”，会后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在战后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的背景下，工会组织及工人运动出现了蓬勃发展局面。1946 年末至 1947 年初，工人运动一度发展为反对吉田茂内阁的倒阁运动。

战后，日本的工人运动获得全面发展，各种工会组织纷纷成立，如全国产业界劳动组合联合、日本劳动组合总评议会（“总评”）、日本劳动组合总同盟、全官公厅共同斗争委员会、全国劳动组合共同斗争委员会、全日本劳动组合会议等。工会组织和领导的斗争风起云涌，目标是保障就业、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以及推动员工参与生产管理。

战后不久，有着战争体验的一批知识分子开始思考战争与和平、战争责任与历史认识问题，这也成为日本和平运动的出发点。1948 年，丸山真男、久野收、都留重人、清水几太郎、安倍能成等 50 余名著名知识分子成立了“和平问题谈话会”，该团体在 1949~1951 年期间活动十分活跃。“和平问题谈话会”的主旨是“全面媾和、坚持中立、反对重整军备、反对提供军事基地”的“和平四原则”。之后，该原则为社会党左派、“总评”所继承，对于战后民主主义在日本社会的普及和扎根起到了促进作用。

^① 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赵旭东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557 页。

1954年3月美国在比基尼岛礁进行的氢弹试验，导致正在附近海域作业的日本渔船“第五福龙丸”船员们受到放射性尘埃污染而致病，另外，多达856艘日本渔船被称之为“死灰”的核物质污染，从当地捕获的金枪鱼身上也检验出了大量核辐射物。该事件是日本继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后又一次受到核武器的侵害，也成为日本反核运动的导火索。事发后，出于对核污染的忧虑，为了下一代的健康，以东京杉并区的主妇为先导，禁止氢弹的签名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截至1955年在广岛召开的第一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征集到了高达3000万个签名。以“比基尼事件”为契机，民间结成了“禁止原子弹氢弹日本协议会”（原水协），之后，反氢弹试验、反核运动迅速扩展到全日本。与此同时，1955年第一届日本母亲大会召开，妇女们纷纷控诉战争带给妇女的伤害，表达了对战争、对核武器的坚决反对以及对和平生活的向往。之后，母亲大会每年召开，迄今已召开了60届。每届都聚集了成千上万的参加者，成为战后日本社会运动特别是妇女运动中极具影响性的事件之一。^①

（二）经济高速增长长期的社会运动（1956~1973）

“1955年体制”形成后，政党格局长期维持执政党自由民主党与在野党日本社会党的两党格局。在自民党长期执政期间，日本实现了工业化、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并跻身于世界经济大国之列。同时，“1955年体制”期间，保守的执政党和革新政党之间斗争不断，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也在不断高涨。

经济高速增长期，革新、左翼思潮势力强大，和平运动、学生运动、安保斗争、反公害运动及捍卫自身权利的社会运动风起云涌。这一时期的和平运动是在50年代和平运动的延长线上展开的。一些亲身经历过战争、不断反思战争并爱好和平的人士结成各种团体，进行了维护和平、反对战争、防止战争在日本重演的运动。1965年，一批社会党、“总评”系统的人士从“原水协”分裂出来成立了“禁止原子弹氢弹国民会议”（原水禁）。在该组织领导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核游行示威。反核运动超越思想、宗教、政党政治派别，发展成为一场广泛的国民运动。1959年至1960年，由国会议员、劳动者、学生、市民参与的反对《日美安全条约》的抗议行动如火如荼，作为日本历史上空前规模的政治斗争，最终导致了岸信介内阁总辞职。1960~

^① 参见胡澎：《母亲大会：历程、特点与意义》，《日本学》第15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

1975年越南战争期间,小田实等人发起成立了“为了实现越南和平的市民联合”(1965年成立,简称“越平联”),目标是反对越南战争、反对日美安保同盟等。这一时期,以该团体为代表的反对越战运动声势浩大。与此同时,作为社会党的支持者,“总评”继续高举“和平四原则”的旗帜,持续开展了反对日美同盟、反对越南战争的和平运动。

1956~1973年,日本实际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平均增长10%以上,创造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上罕见的“经济奇迹”。1966年日本超过英国,1968年又超过联邦德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中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负面问题。例如,随着新干线、机场、港口、水电站、核电站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钢铁和石油化工产业的开发,自然环境遭到破坏,生活环境持续恶化,公害问题日益严峻。与此同时,在城市化进程中,大面积绿地缩减、珍贵野生动物减少、山村景观遭到破坏。针对公害问题,受害地区居民团结起来进行抗议,开展了多种多样的反公害运动。1973年,在民众多年的抗争之下,水俣病、四日市哮喘病、骨疼病、第二水俣病为代表的四大公害病以受害居民的胜诉而告终。针对自然生态环境恶化,民众为保护生存环境,捍卫生存权利,在全日本范围内开展了各种有针对性的环境保护运动。

另外,这一时期以三里冢反对征地运动为代表的民众捍卫自身权利的运动引人注目。1966年6月,日本政府决定将千叶县三里冢芝山地区作为国际机场候选地^①,但未与当地农民沟通。三里冢农民闻风而动,成立了“三里冢芝山机场联合反对同盟”进行抗争。1971年,在政府强制征地行动中,同盟成员与警察发生冲突,导致三名警察死亡、双方各有多人受伤的惨剧。最终,政府不得不把原先建设三条机场跑道的计划缩减为一条。

除此以外,1955年的砂川斗争^②、1957年的“反对勤评斗争”^③、1958年的“警察执法反对运动”^④也各具特色。以学生为主体的“全共斗运动”^⑤在

① 20世纪60年代初,日本政府决定建造一个代替羽田机场的国际机场,最初选在现成田机场地址以南四公里一个叫富里的地方,但是富里地区的农民发起了激烈的反对建机场运动,政府只好作罢。

② 1955年3月得知驻日美军要求在小牧、横田、立川、木更津、新潟扩建五个机场的消息,当地居民结成了“砂川基地扩张反对同盟”,召开了反对机场扩建的誓师大会,开始了“砂川斗争”。

③ 1957~1958年针对强制执行对教员工作成绩的评定,被认为破坏了教职员之间的团结,是以权力对教育的统制,因此,以教职员组合为中心在全国开展了激烈的反对斗争。

④ 1958年10月,针对《警察官职务执行法》修订而开展的抗议活动,主要参与者是社会党、总评、全日农、护宪联合等七家团体。11月5日有400万人参加了街头抗议行动,导致修订搁浅。

⑤ 20世纪60年代末波及全日本的学生运动。当时参加者多为“团块世代”的大学生,他们中后来诞生了多位自然环境保护运动、消费者运动的领导者。

1968~1970年期间达到高潮。60年代末，妇女为争取自身权利以及男女平等目标而发起了妇女运动等。这些运动的主体是普通居民、家庭主妇、学生、教师、老年人等，他们对各自权利的要求和捍卫为这一时期社会运动增添了色彩。

（三）经济稳定增长期的社会运动（1974~1990）

1973年和1979年的两次石油危机，使得日本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稳定增长。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基本处于稳中上升阶段。到了80年代，日本迎来了经济迅速全球化的时期，日元升值，海外旅行人数增长。70~80年代的日本社会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如人口向东京等大城市圈集中，单身家庭增加，妇女就业率提高，家用电器普及，生活愈加方便。但同时也出现了相当多社会问题，如自民党集权政治及内部存在的腐败问题导致民众强烈不满，“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社会经济体系带来了民众对生活方式的思考，汽车尾气导致大气污染，生活废水导致地下水水质污染，城市生活型公害问题引发民众的强烈关注。

70年代以后，日本的社会运动开始由政治领域逐渐转到生活领域，表现在运动目标与生活的关系日渐密切，消费者运动、生活者运动等具有“新社会运动”特征的社会运动成为主流。8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国民生活方式、价值观的日益多元化，要求对支撑经济发展的官僚主导的社会运行机制和以大企业为中心的经济体制予以改革的呼声高涨。这一时期，对社会体制产生异议并对公共政策产生影响的市民运动一度消沉，而市民在日常生活中结成各种网络、市民团体的活动却日渐活跃。一批曾参与过社会运动的人士开始从街头运动走向社会变革。例如，20世纪70年代中期，曾参加过学生运动的藤田和芳创立了“守护大地会”，分别以社区企业和非营利组织两种运营方式，通过建立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透明、互动的关系，促进双方收益分享和土地与环境保护。目前该会已发展成为拥有2500个生产会员、9.1万个消费会员、年营业额达150多亿日元的庞大组织。社会企业作为变革社会的一种方式与社会运动殊途同归。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日本民间团体不仅作为战争的受害者来反思战争，同时也站在加害者的立场思考和研究日本的战争责任。他们编辑资料集、发行简报、举办演讲会和展示会等，还到日军曾侵略过的国家采访战争的受害者、幸存者，调查、搜集战争期间日军的罪行和证据，掀起了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社会运动。另外，80年代中后期，反核运动呈现

多样化特征，反核内容扩展到废除核武器、缩减军备、核电、人权、战争责任等诸多问题。这一动向，使得社会党、共产党、“总评”等工会组织为主体的和平运动演变为多种目标的和平运动，并植根于日本社会。^①

（四）经济长期低迷期的社会运动（1991~2015）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导致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的冷战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由此进入一个多极化、大竞争的时代。日本的国内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泡沫经济”崩溃后，股票、地价等资产价格急剧下跌，不少企业倒闭，金融机构不良债权严重，一些产业向海外转移。“泡沫经济”崩溃后的 10 年、20 年又被称为“失去的 10 年”、“失去的 20 年”。与之相伴随的是劳动者收入减少，临时工等非正式雇用劳动者增加，社会差距拉大等。另外，日本社会少子老龄化现象日益严峻，导致劳动力人口减少，医疗费用剧增，养老保险资金入不敷出，同时也出现了远离大城市的偏远地方年轻劳动力缺失，经济发展后劲不足，缺乏活力等问题。少子老龄化给日本的综合国力、社会结构、经济发展和人才培养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已成为日本社会经济发展道路上的严重阻碍。2011 年 3 月 11 日，大地震与海啸、核泄漏多重灾难叠加，使日本经济、社会乃至国民心理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是日本民主主义发展和壮大的时期，也是日本社会运动异常活跃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社会运动呈现出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

一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运用居民投票等直接民主主义方法的居民运动显著增加。例如，新潟县卷町的核电站建设抗议运动，阪神淡路大地震后针对神户机场建设的抗议运动，德岛县吉野川河口堰建设抗议运动等。这些运动的突出特点是诉求方式平和，运动形式灵活。一些社会运动开辟了居民与政治相关联的直接民主主义的新道路，并对地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

二是非营利组织发展迅速，在推进市民参与、社会治理和社区建设中发挥着积极作用。阪神淡路大地震后，大量志愿者和民间组织开展了积极的灾后救援。之后，民间组织如雨后春笋般迅速成长，促进了市民社会的成熟。今田高俊认为：“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居民自发的志愿活动活跃起来，特别是 90 年代的志愿者活动和 NPO、NGO 活动的高涨具有象征性意义。这表明，

^① 安田浩「戦後平和運動の特徴と当面する課題」、『日本社会の対抗と構造』、大月書店、1997 年。

人们在公益性较高的服务供给上不是靠政府，而是用自己的力量来解决。”^① 1998年《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的制定，对于社会运动的发展有着里程碑意义。该法实施后，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迅猛增长，在反对战争、保护环境、伸张人权、开展慈善和公益活动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社会运动也由此进入到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正如萨拉蒙在分析美国社会运动时所指出的：“几乎所有的美国重要的社会运动，如民权运动、环境保护、消费者运动、妇女或保守派等，都扎根于非营利领域。这一现象的增长确实引人注目，因为与此同时发生的像选举、政党、工会这些更加传统的政治参与形式正在逐渐衰落。”^② 进入21世纪后，日本的社会运动表现为遍布各地区、各领域、各行业的非营利组织、民间团体、志愿者组织的日常化活动，并取得了突出成就。当今日本社会，非营利组织已成为改善公共治理的一支新生力量，有力地推动着社会变革。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民众的男女平等意识及人权意识有了明显增强。一些妇女运动家、女性主义者、妇女团体站在人权的高度，从社会性别的视角来审视加在妇女身上的不平等和对妇女权利的践踏，特别是在反对家庭暴力方面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并促成了一部专门针对婚姻暴力的法律《防止配偶间的暴力及保护受害人的法律》（2002年4月1日实施）出台。

三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社会呈现出整体右倾化倾向。一些右倾、右翼政治家、知识分子和媒体人把持着政治、经济和媒体的重要部门，以冠冕堂皇的理由蒙蔽民众，推动日本朝着民族保守主义方向前行。例如，以小泽一郎为代表的政治家呼吁日本应摆脱“战后心理”，要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即在国际体系中承担的责任与其经济地位相称的国家，具体而言就是修改宪法，以允许向海外派遣自卫队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或其他的国际安全机制。一部分政治势力极力想冲破宪法第九条的制约，修宪风潮愈演愈烈。与此同时，随着中国、韩国国力的上升，日本在亚洲的优势地位受到挑战。面对中国的崛起，日本国民的优越感逐渐丧失，对日本未来深感忧虑。这种茫然不安的心态，也使民族保守主义思潮有了可乘之机。一些右翼分子针对中、韩两国采取了一些排外、排他的集体行为，如针对钓鱼岛和独岛（日称

^① 转引自佐佐木毅、金泰昌主编：《中间团体开创的公共性》第七卷，王伟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页。

^② 转引自何平立：《西方新社会运动趋向析论》，《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尖阁列岛、竹岛)的示威、反对外国人参政的游行、日韩断交游行等。

进入21世纪,针对新一股修宪浪潮,涌现出了众多的反对修宪市民团体,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成立于2004年的“九条会”。该组织聚集了井上厦、梅原猛、大江健三郎、加藤周一、奥平康弘、小田实、泽地久枝、鹤见俊辅、三木睦子九位著名知识分子和文化界人士,旨在捍卫和平宪法,实现日本与世界的和平。在其影响下,各地区、各行业、各领域纷纷成立各种各样的“九条会”。如“冈山九条会”、“大阪九条会”、“科学家九条会”、“女性九条会”、“日中友好九条会”、“诗人九条会”、“科学家九条会”、“影视界九条会”等。据东京大学教授小森阳一介绍,2012年该会下属的“九条会”已经达到7500多个。^①“九条会”成为反对修宪运动中一支重要的力量。

颁布于1947年的《教育基本法》作为二战后日本民主化改革的重要产物,长期以来是日本教育领域各种法令和解释的基础,因此也被称为“教育宪法”、“教育宪章”。2006年4月28日,文部科学省正式向国会提交“《教育基本法》修正案”,在支持该修正案的势力中,除执政党、鹰派政治家之外,一批右翼保守主义团体和知名人士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像“日本会议”、“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谋求新的教育基本法之会”、“日本教育改革有志者恳谈会”、“日本教育再生机构”等团体负责人与某些政治家和政府官员在修改基本法上不谋而合。他们密切配合,构成一股推动基本法修正案在国会通过的强大势力。而与此相对的是反对修改《教育基本法》的社会运动。该运动旗帜鲜明地打出了“捍卫基本法的民主、自由精神,反对改恶教育基本法”的口号。不少市民团体以及运动参与者在运动中高度团结、密切配合,将反对修改《教育基本法》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

近两年,针对解禁集体自卫权和新安保法案的通过,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抗议浪潮。2014年7月1日的内阁会议上,日本政府正式决定解禁集体自卫权。会议当天即遭到许多民众的强烈抗议。2015年6月,由多名日本宪法学者和作家组成的“反战千人委员会”向日本国会提交了165万个群众签名,反对解禁集体自卫权,要求撤回新安保法案。2015年,7月15日,日本政府不顾民众的强烈反对,在众议院全体会议强行表决通过安倍政府提交的新安保法案,其核心是解禁集体自卫权后扩大日本自卫队在海外的军事活动,又被称为“战争法案”。新安保法案甫一出台,即遭到日本民众的强烈反对。民

^① 转引自刘晓峰:《“平成日本学”论》,《日本学刊》2015年第2期。

众自发组织的反对集会和游行动辄上万人，声势浩大，此起彼伏。据《朝日新闻》及共同社的民调显示，在强大的反对浪潮中，安倍内阁支持率已有所下降。

四是反核运动自2011年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爆发后又重新掀起了高潮。其中，大江健三郎发起的“再见核电站”大集会十分引人注目。在2012年的一次集会上，该组织向东京都政府提交了32万人的反核签名，呼吁关闭日本所有的核电站，实现“无核化”。反核民间组织“首都圈反核联盟”每周五都在首相官邸进行反核游行，游行者在国会议事堂周边1.5公里长的人行道并排站立，以示抗议。反核游行以普通市民为主，参与广，规模大，持续时间长，堪称继20世纪60年代“安保斗争”以来最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二 日本社会运动的类型

日本的社会运动种类繁多、成分复杂，一些社会运动不排除背后有着特定的商业、政治利益等多种集团存在，因此，需要针对不同的社会运动，对其目的、背景和活动内容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再对社会运动整体进行全盘评价。本文依据社会运动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将战后70年日本的社会运动划分为对抗型、要求型和建设型三种。

（一）“对抗型”社会运动

站在与政府对立的立场、反对或阻止政府的某些政策或行政的市民运动被称之为“对抗型”社会运动。这类运动主要有两大类。

第一类是为了保卫自己生存环境和自身利益的运动。包括：20世纪70年代针对经济高速增长、过度开发带来的公害问题产生的抗议和反对运动，以及针对政府一些侵害自身权益的开发项目发起的反对运动；贯穿战后70年的反核运动；针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驻日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的坠落事故、噪音扰民以及基地美军对冲绳女性的性侵事件而爆发的冲绳反基地运动等。

第二类是为了实现理想和捍卫理念的一种运动。如：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学生为中心的安保斗争，贯穿战后70年的反战和平运动与反修宪运动，70年代以后反核、反对核电站的运动^①，90年代以来反对采用右翼教科书的运

^① 早在20世纪70年代，在计划兴建核电站地区，民众发起了反对核电站建设的运动，城市也有反对核电站的游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和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之后，这一运动表现得更为兴盛。近年来，东京、福岛县乃至全日本多次爆发了要求废除核电站的游行活动，人数多达数万。

动,近两年来反对解禁集体自卫权以及反对新安保法案的运动等。另外,还有现代化进程中被排挤和歧视人群为主体的部落解放运动,消除对女性实施暴力行为的运动等。这些运动均有着鲜明的“对抗型”特征。

其中,反对右翼教科书运动很有代表性。日本中小学施行教科书审定制度,民间编纂的教科书需由文部科学大臣审查通过,各地教育委员会自行决定所管辖学校采用哪种教科书。2001年,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主导编写、扶桑社出版的历史教科书引起了日本有良知人士的激烈反对,民间团体发起了让扶桑社教科书采用率为零的运动。他们召开集会、演讲会,对各地教育委员会进行动员。在强大社会运动推动下,该右翼教科书的采用率非常之低。2007年扶桑社全额出资成立了育鹏社,该社出版的历史与公民教科书承袭了扶桑社教科书的错误和修正主义历史观,一经出版即遭到了教育界有识之士和一些民间团体的强烈抗议和反对。目前,以“21世纪儿童与教科书全国网络”为首的民间团体正在发起阻止育鹏社教科书进入学校的运动。

另外,“对抗型”社会运动中也包括针对工厂公害、交通公害、食品公害等公害的反对运动,以及充实和完善与福祉、文化、教育相关的公共设施的请愿运动,针对垃圾处理场的建设以及机场、新干线、高速公路、核电设施、水电站等大规模公共设施建设的抗议运动等。

(二)“要求型”社会运动

“要求型”社会运动在参与社会、表示不满、表达愿望的方式上更为温和,其规模较对抗型社会运动要小,参与者大都居住在某一特定地区,并以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式表达对平等权、自由权、环境权、生存权、发展权、和平权等方面的要求和愿望。“要求型”社会运动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信息公开运动、居民投票运动、生活者运动等为代表。同时,一些“对抗型”社会运动也逐渐转为“要求型”社会运动。例如,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及政府对环境问题的重视,公害问题、过度开发问题等均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以反公害、反过度开发等为目标的环境保护运动,逐渐由“对抗型”转变为要求政府对公害企业采取某种行政措施、防止公害发生的“要求型”。这类“要求型”社会运动大多不是政党和劳动组合等既有组织主导的,而是地区居民为主体发起并参与的。

“要求型”社会运动,以1995年围绕新潟县卷町修建核电站的居民投票运动最具代表性。当时,卷町居民对是否出卖预定建设核电站的町有土地分

成了两派意见。在町长选举中，主张进行居民投票的领导人当选。之后，町议会通过了居民投票条例。1996年8月，在投票条例的基础上实施了日本历史上首次居民投票，投票率高达88%，反对建设核电站的占半数以上。最终，反对修建核电站的议案获得通过。之后，各地纷纷效法卷町，在抵制美军基地、要求驻日美军撤走的冲绳，在抗议建设产业废弃物处理设施的岐阜县御嵩町，以及在针对是否修建吉野川可调节堤坝的德岛县等地，都进行了居民投票。

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运动不再表现为居民与自治体的“对抗型”运动，而是自治体与居民团体通过对话、沟通、居民参与、居民监督来完成。居民投票运动直接冲击了旧有的日本政治文化和价值观，也逐渐改变着国家与地方的关系，开创了居民在选举之外参与自治体政策决定过程的道路。

居民投票成为居民参加公共性讨论、获得发言权的重要一步，给居民创造了参与政治的机会，并在地域政策中体现了居民的愿望。近年来，居民的主人翁意识愈加强烈，居民参与逐渐过渡到了居民自治。

（三）“建设型”社会运动

“建设型”社会运动，最具代表性的是社区营造运动和代理人运动。社区营造运动包括两种类型：（1）因人口稀少等原因而面临衰退的地区为激发当地活力而开展的一系列活动，多见于地方的中小城市、农村和山村；（2）市民为了保护生活环境、提高地区生活质量而进行的一些运动，多发生在大城市的郊外地区。社区营造运动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最早开展的运动是保存街区景观运动。该运动始于20世纪60~70年代，由一些热爱家乡的居民自发成立组织，针对城市化进程使城市景观和原有历史文化风貌面临被破坏的危险而开展运动。居民们在城市建设基本法的框架下，提出了既能保存城市历史文化景观又能配合城市化进程、旧城改造的提案，不少提案得到了地方政府的认可并得以实施。

代理人运动是“生活俱乐部·生协”的理事长岩根邦雄在1977年3月发行的机关报《生活与自治》中正式提出并呼吁发起的。生活俱乐部的成员们在禁止使用合成洗涤剂的运动以及对自治体的直接请求运动中深刻认识到：要想将市民的声音反映到政治中，必须推选自己的“代理人”去参与政治、改革政治。1977年东京都议会选举时，东京都练马区的生活俱乐部推选土屋正枝作为候选人参与都议会议员的竞选，虽未当选，却是代理人运动的首次尝试。同年10月，东京都练马区几位有政治抱负的成员结成了政治团体——

“生活者小组”^①。在练马区首位区议员即“代理人”诞生之后，代理人运动向其他地区辐射，并迅速扩展到神奈川、千葉、埼玉和首都圈的其他地区以及北海道、长野等生活俱乐部所覆盖的主要地区。同时，代理人运动还影响到其他“生协”领域。^② 代理人运动不仅仅是简单地推举代理人参加竞选并使之进入议会，而且要求代理人进入议会之后，经常将居民、会员对政策的提案反映到议会，开辟了一条市民参与政治的新的道路。

以地缘为纽带的市民活动团体、非营利组织大都由社区居民组成，其活动与社区居民的生活密切相关，如根据居民的需求，展开保护消费者利益、文化体育、社会教育等各类居民活动，并在社区环境治理、社区治安维护、社区就业和社区社会保障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还有些市民活动团体和非营利组织，致力于社区建设和福利，协调居民与政府、社区与社区之间的关系，形成了社区互助、互动的网络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居民运动常伴着地区利益之间、公私利益之间以及公共利益和地区利益之间的摩擦。比如核电站和垃圾处理场的建设问题、有毒药品的处理问题、机场建设问题、噪音问题、采光权问题、高速道路建设问题等关系到基本人权以及市民与公共性的关系。有些问题则涉及全体利益与部分人利益之争、涉及国家利益和地区利益之争、涉及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之争。因此，既不能由国家、自治体来单方面对公共性进行决定，在公共性的名义下侵害部分居民的基本人权，同时，也不能让处于利益矛盾中的各方长期处于对峙和争斗局面。因此，在进行社区建设、城镇建设中，“建设型”社会运动显得尤为重要。

三 日本社会运动的特征

战后日本社会运动的产生，缘于社会问题的出现。随着社会问题的解决，社会运动的目标、方式、内容和参与者也逐渐发生变化。一些社会问题由于政府缺乏应对措施，而民众在政府之外寻求解决的途径是一种市民参与。市民广泛的社会参与，标志着日本“新中间阶层”的出现及成长，也是日本市

^① 后演变为练马·生活者网络。

^② “生协”是生活协同组合的简称，是一般市民以提高生活水平为目标结成的进行各种活动的团体，也指在消费生活协同组合法之下成立的消费生活协同组合。

民社会走向成熟的标志。另外，互联网的应用在社会运动中重要性加强，社会生活领域的社会运动正在由“对抗型”转向“建设型”，而随着20世纪90年代日本民族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思想领域民族保守主义与和平民主主义的交锋呈现激烈态势。

（一）社会运动与社会问题密切相关

社会运动具有快速应对新出现的社会问题的特点。社会问题的出现总是会带来社会运动的产生。例如：20世纪50年代以后，驻日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的坠落事故、训练噪音扰民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引起当地居民的不满，特别是基地美军对冲绳女性的性侵事件屡屡发生，激起了当地居民的愤慨，多次爆发席卷冲绳的反基地运动。另外，反对修宪运动、反对右翼教科书、反对修改《教育基本法》、反对解禁集体自卫权、反对新安法案等“对抗型”社会运动的出现，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民族保守主义思潮的泛滥有着很大关系。

随着一些社会问题的改善和解决，社会运动的目标和方式也在发生变化。如，战后不久出现的劳动者贫困和生存问题以及劳资纠纷问题促成了工会运动，但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工人劳动环境的改善以及工资待遇的提高，特别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普及，工人运动已经不再占据社会运动的主流，取而代之的是居民运动的登场。

从反公害运动到环境保护运动也体现了社会运动目标和发展方式的变化。经济高速增长期轰轰烈烈的反公害运动随着公害问题的逐步解决而衰退，当今的环境保护运动更加关注生活环境和自然环境的保护、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社区的绿化美化、低碳环保的生活方式、再生利用以及食品安全等。

进入21世纪，伴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而出现的诸如少子老龄化、社会差距、非正式就业等问题引起日本社会广泛关注，社会运动的主要目标也相继调整为强调可持续发展、重视以人为本、促进世界和平、致力公正公平、改善生态环境、加强社会建设、消除家庭暴力、保障妇女权益以及关注弱势群体等。非营利组织和市民团体在日常生活中发现问题后，往往不采用以往那种游行示威等方式谋求解决，而通过市民参与、非营利组织与政府及企业采取“协调”^①的方式来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

^① 日本NPO中心为“协调”下的定义是：不同种类不同性质的组织为了达成一致的社会目的，在保持各自资源、特性的基础上，以平等的立场协力共同采取行动。“协调”的要素有以下几点：各个主体有着共同的目标；主体自主、自律与平等；为了达成目标，各主体之间应各有偏重，相互弥补；各主体承担相应的责任；依据求同存异的原则，相互尊重各自特点，达成目标。

（二）社会运动的主体是“新中间阶层”

战后初期工人运动的主要目标是民众对生存权的要求和捍卫，运动主体是广大劳动者阶层。“1955年体制”确立后，社会运动主体发生了变化，具有较高学历、受过专业化训练、主要从事脑力劳动、以工资薪金为生的“新中间阶层”，开始作为社会运动主体登上历史舞台。20世纪70年代是“新中间阶层”迅速兴起和壮大的时期。70年代中期，日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5000美元，家庭的年收入增加了10倍以上，全国城市数量从1953年的286个发展到1975年的643个。^①有近80%的日本国民持有“中流意识”。^②因此，70年代以后，“新中间阶层”成为社会运动的主体已是不争的事实。正如日本社会学家三浦展所言：“‘1955年体制’在政治上是东西方冷战时代的产物，在经济上则正好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相契合，而在消费方面，这个时期又是大众消费社会不断发展，中流社会逐渐扩大的时期”“‘1955年体制’所追求的是社会财富的平均分配，是全社会所有人群的‘中流化’”。^③

如果再具体分析，“对抗型”社会运动、“要求型”和“建设型”社会运动的参与者也有细微差别。像反对修改和平宪法、反对修改《教育基本法》、反对右翼教科书等“对抗型”社会运动的主要参与者，是有良心、有责任感的市民，运动的目标与他们的生活虽无特定的利害关系，却显示了他们作为国民对国家政治、外交、教育等政策的关心和政治理念。“要求型”和“建设型”社会运动的参与者，主要是生活在同一地区的居民，他们的日常生活与运动的目标有一定利害关系，运动的要求也较明确和具体。如环境保护运动的参与者主要是当地受到环境问题困扰的居民，当然也不排除来自外部对环保运动予以声援的环保主义者。

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60年代初，教育领域的社会运动参与者主要是日本教职员组合（“日教组”）和全日本教职员组合（“全教组”），他们积极进行争夺教育主导权的反体制斗争。在反对右翼教科书运动中，“日教组”、“全教组”、“教育基本法全国网络”、“反对改恶教育基本法埼玉之会”、“儿童人权埼玉网”、“21世纪思考儿童培养与法律制度的市民之会”等团体，站在运动最前沿，其参与者主要由教育一线的教职员、知识分子和退休教职员工构成。

在思想领域的各种社会运动中，知名人士、知识精英、文化名人充当了

① 本間康平・田野崎昭夫・光吉利之・塩原勉編『社会学概论』、有斐閣、1988年、308頁。

② 福武直『日本社会の構造』、東京大学出版会、1987年、146頁。

③ 三浦展：《下流社会》，陆求实、戴铮译，上海：文汇出版社，2007年，第6页。

运动的领导者。如：以“九条会”为中心的反对修改和平宪法的运动中，以大江健三郎为代表的九位知名文化界人士显示了在民众中的强大号召力，东京大学教授小森阳一、高桥哲哉等在运动中发挥了骨干作用；在冲绳反基地运动、反对驻日美军对冲绳女性的性暴力运动中，也活跃着不少妇女运动家和女性精英，如冲绳女性史专家宫城晴美、社会活动家野口裕子和安里英子等；在社区营造运动和历史文化街区保存运动中，一些具备法律、经济、建筑设计等方面专业知识的人士作为领导人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值得关注的是，在反核运动、反战和平运动、生活者运动、消费者运动、代理人运动等众多日本社会运动中，家庭主妇成为运动的主要承担者。参与运动的主妇们往往有着较高学历，对食品安全、环境污染、老年人护理、青少年问题等与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问题十分关心。出于母性的本能和对下一代健康所担负的使命感，她们对核武器有着强烈的憎恶和危机意识，在反战和平与反核电站建设运动中表现得非常积极。不仅如此，不少家庭主妇也对日本能否走一条与亚洲邻国和睦相处的和平之路深感忧虑，2015年7月，为了反对新安保法案的通过，一批母亲自发结成“反对安保相关法案妈妈会”，在东京举行了多次游行和抗议。

进入21世纪，非营利组织成为社会生活领域中社会运动的主体，由于活动涉及环境、福利、教育、贫困、社会差距等广泛内容，运动参与者的成分十分复杂，一些非正式就业者、老年人、生活贫困者等社会边缘群体、弱势群体加入了进来。

（三）互联网在社会运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有些运动有国际化倾向

互联网在当今的社会运动中起着互通信息、宣传理念、广泛联络、采取一致行动的重要作用。市民团体、个人都可以在互联网上建立主页、进行链接、相互配合与支援，并有可能采取一致行动。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益活跃的民族保守主义思潮成为主流社会思潮，日本各大主流媒体的右倾保守化色彩日益浓厚。在这样的社会舆论形势下，诸如反对右翼教科书等“对抗型”社会运动的相关消息和报道在报纸、杂志很难刊登，一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政府和相关政策批判的声音也很难发出来。于是，互联网便成为市民团体发布报告会、集会、游行等消息的最快捷的传播渠道。各市民团体在互联网上建立主页，宣传理念，发布消息，并建立与其他市民团体的链接。通过互联网传播，原本规模小、影响力弱的市民运动往往会演变成多个领域、多个地区市民团体的联合行动。

伴随经济全球化的进展，越来越多的社会运动与国际NGO和国际上的社

会运动产生密切联系,呈现出日益汇入世界社会运动大潮的趋势。例如,生活俱乐部与世界各国 NGO 经常进行交流,携手合作。追究日本战争责任运动将东亚的民间团体、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聚到一起,中日韩三国的市民团体、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普通民众开展了各种交流、声援和相互支持的活动。

(四) 社会运动由“对抗型”转向“建设型”

20世纪50~60年代的社会运动大多是“对抗型”社会运动,主要采取罢工、抗议、请愿等较为激进的方式,例如总评、中立劳联等工会组织自1955年后,在“春季斗争”前对运动的进程进行预先设定,采取先团体出面交涉劳资纷争,达不成协议再罢工的方式。60年代“安保斗争”时,大学生也与警察发生了冲突,出现了人身伤害、放火、破坏财物等暴力行为。随着战后民主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市民社会的成熟,社会运动的暴力性逐渐减弱。当今日本的社会运动基本上根除和杜绝了阶级斗争、暴力革命以及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矛盾尖锐化,社会运动很少或基本不采用罢工、暴力等激烈形式。大多数都道府县对游行示威都制定了管理规定,游行的主办方事前要向涉地警察署提出要求并获得许可。^①游行示威被置于法治国家的框架下,没有经过许可的游行会被取缔。因此,日本的社会运动在游行示威等方面非暴力特征十分明显。像反对修改宪法、反对修改《教育基本法》、反对右翼历史教科书等“对抗型”社会运动主要以召开集会、演讲会、研讨会、学习会、说明会、街头演讲、在街头散发宣传品等形式为主,组织工作周密,集会秩序井然,即便是上万人规模的游行,也大都平和有序,较少发生混乱或出现暴力事件,对城市交通和市民生活的影响被控制在极小范围。这一点与战后工人运动通常采取的工会和政党的斗争方式有着本质的不同。

随着社会运动的特征由以往的“对抗型”转向“建设型”,要求、提案和参与型的居民运动在日本呈现扩展趋势,其主要形式是直接请求、参与选举、居民投票、集体诉讼、请愿陈情和制造社会舆论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运动更多、更普遍地表现为一种温和而渐进的改良性运动。这些运动的目标虽不尽相同,但运动的参与者希望通过这一手段改变生活现状,提高生活水平,追求一种充实、富裕、安全的生活。社会运动由先前那种大

^① 在城市道路上游行需要在《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7条的基础上接受所属警察署长的许可,此外,游行活动要遵从县、市的公安条例。国会议事堂、外国使领馆、政党事务所等周边地区要遵守《保持国会议事堂等周边及外国公馆等周边地区安静稳定的相关法律》,限制使用扩音器。对游行中搞破坏的团体,按照《破坏活动防治法》予以六个月之内在规定地区禁止游行的处罚。

规模的、与政府对立抗议、表达强烈不满的“对抗型”，转向对政府提出要求、希望政府重视并予以改变的“要求型”。以环保运动为例，在20世纪60~7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反公害民间团体的活动都是针对特定的公害制造企业进行的，运动方式表现得比较激烈，而当今的环境保护运动从反对公害、呼吁合理处理废弃物过渡到关注人们生活品质、食品安全上，方式比较温和。^①当整个社会变得富裕、公害问题得到有效解决的时候，环境保护运动的特征也就变成了参与性和建设性。

作为“建设型”社会运动代表的社区营造运动，走的是一条通过社区建设来实现居民自治的道路，不仅解决了市民日常生活中的问题，提高了市民生活水平，还对地方行政起到了促进作用。在社区营造运动的推动下，许多自治体相继制定《城镇建设条例》、《都市计划条例》等，承认和保障市民会议、协议会等居民组织参与城市政策制定。社区营造在社区发展、社会治理过程中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五）民族保守主义与和平民主主义为代表的两派力量激烈交锋

冷战结束后，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垒结束。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日本国内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作为左翼势力代表的日本社会党的衰弱以及解体，造成了革新力量在与保守势力制衡上衰退。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长期不振，与之相反的是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经济快速发展。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入21世纪，日本社会弥漫着一股强烈的危机意识，对日本前途产生茫然情绪。一些右翼政客在领土问题、历史问题上屡屡发言，企图通过将中国树为假想敌，把国内民众的不满情绪归咎于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以迎合日本国民希望重振日本往日“辉煌”的愿望。一时间，“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在日本甚嚣尘上。

目前，民族保守主义思潮主要表现为新保守主义、历史修正主义和民族主义等。值得警惕的是，一些右翼团体致力于民族保守主义思潮的普及和推广。包括暴力团系统的街宣右翼团体、全国学生自治联络协议会为代表的右翼学生团体、神社本厅和灵友会^②等宗教右派团体以及主张重整军备和对中国强硬路线的“幸福实现党”等宗教政党。一些右倾和右翼政治家、知识分子垄断主流话语权，主张“正常国家论”，不断强化日美同盟关系，企图修改

① 今西一男「住民運動による普遍的公共性の構築」、『社会学評論』第49卷第2号。

② 该右翼组织与自民党有着多种联系，是支持自民党的团体“日本会议”的参与者。

和平宪法，谋求改变战后日本的和平发展路线。另外，一部分民众特别是青年人以自己生活为中心，远离或不关心政治。这样一来，民族保守主义思潮便在日本大行其道。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日本社会思潮的变化无疑会折射到社会运动之中，表现为民族保守主义与和平民主主义两派势力的激烈交锋。长期以来，新保守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一直将修改宪法、为日本成为政治和军事大国扫清“障碍”作为奋斗目标。面对这一思潮的泛滥，一批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和民众组成的市民团体奋起反击，衍生出大量“对抗型”社会组织。反对右翼教科书运动、反对修改《教育基本法》运动、反对修改和平宪法运动、反对解禁集体自卫权运动、反对新安法案运动是与反对日美安全条约的斗争，反对核武器、核试验、核竞赛的运动，反对越南战争、反对驻日美军基地的斗争一脉相承的。

例如，反对修改《教育基本法》运动就是对民族保守主义思潮的一种抵抗。长期以来，执政党、在野党、文部省、市民团体、教育界人士以及普通市民在《教育基本法》修改的问题上有着各自不同的见解，在支持与反对修改基本法上形成了两股力量，这两股力量随着基本法修正案的法制化进程而逐渐演变为一场思想领域激烈的斗争。2006 年，围绕是否修改基本法的两股力量的斗争呈现白热化。这一年，参与运动的团体数量众多。从团体成立时间来看，有成立于战后且一直致力于追求和平、民主与平等的市民团体，也有 90 年代以来成立的进步市民团体，还有在反对基本法运动中新成立的市民团体。虽然运动未能阻止《教育基本法》的修改，但这些市民团体在教育问题上的鲜明态度和开展的一系列活动，无疑对政府的决策构成了一定压力，促进了日本社会思潮的多元化。

针对右翼团体编写篡改历史的教科书的风潮，一些民间组织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如“21 世纪儿童与教科书全国网络”、“历史教育者协议会”、“日本战争责任资料中心”、“和平之船”、“历史科学协议会”、“战争与对女性暴力日本网络”、“全国民主主义教育研究会”等民间团体相互配合，分别在 2001 年和 2005 年共同发起了两轮“让扶桑版教科书采用率为零”的运动。这些市民团体召开集会、演讲会，呼吁各地教育委员会、国会议员拒绝右翼历史教科书。在全国各地反对右翼教科书的市民、教师、学者、律师、劳动者、学生等团体的共同努力下，扶桑版历史教科书的采用率仅约为 0.38%，

远远低于“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确定的10%的目标。^①目前,各市民团体正在发起新一轮抵制育鹏社版历史教科书的运动,相关团体针对各地区教育委员会展开了积极的工作,试图影响委员们在选择教科书时不将选票投给育鹏社版教科书。

四 日本社会运动的发展趋势

首先,在社会生活领域,作为一种政治参与方式,社会运动丰富了市民的多样化参政途径,市民通过社会运动表达了对政治的看法和意见。社会运动中的市民团体担负着进行经常性调查、研究、分析,充当早期预警机制,帮助监督和执行政府工作的职责,能及时把其成员对政府的要求、愿望、建议、批评集中起来转达给政府,向政府提出议案并监督政策的实施,又把政府的政策意图和对相关问题的处理意见转达给其成员和市民。社会运动的这一利益表达和利益协调过程,满足了不同群体合理的利益诉求,推动了政府与民众关系的改善。例如,在社区营造运动中,非营利组织针对政府的城市改造计划,不再以大规模抵制或对抗的方式表达意见,而是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建议,广泛征求意见,采取研讨会等方式与政府进行对话,表达意见。地方政府也开始在制定城市建设和发展计划时吸收市民的意见。社会运动对于政府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使法律、法规和政策能够照顾到各阶层人群的需要,保证它的可行性和准确性。

社会运动还对政策决定过程与政策内容予以批判性的监督,对政府行为构成了制约。例如信息公开运动在防止政治家、公务员贪污腐败和从事不法活动上发挥着监督作用;消费者运动保障了消费者的权益,推动了市民生活方式的改变;环境保护运动监督企业的生产经营环境,促进企业推行环境友好型的生产方式,使环境问题得到了明显改善。

因此,可以预测,今后在养老护理、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青少年健康健全发展、社区重新焕发活力等市民们关心、政府措施又比较薄弱的问题上,社会运动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① 2005年9月,“21世纪儿童与教科书全国网络”等16家市民团体发表共同声明,公布了他们调查的教科书采用情况:全日本共有583个地区需要选择下一年春天采用的教科书,已有552个地区明确了采用的版本,其中只有两个地区决定采用右翼教科书。确定下一年春天使用扶桑版历史教科书的公立和私立中学不到50所。这16家市民团体宣称,这套歪曲历史、美化战争的教科书采用率如此之低,是全日本“反对战争、追求和平的人们良知的胜利、草根民主主义的胜利”。

其次,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和平民主主义与民族保守主义两种势力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1989 年曾经作为工人运动主力的日本劳动组合总评议会解体, 意味着工人运动的衰落和左翼力量的消退。同时, 1955 年以来曾在日本国会长期占据第二大党的日本社会党出现衰败和妥协^①。再加上庞大的无党派层出现, 相当数量的民众对政治不感兴趣。这样一来, 作为和平民主主义思潮重要的支持力量逐渐萎缩。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 在民族保守主义与和平民主主义对垒、交锋的过程中, 和平民主主义阵营的式微已较为明显。主张“护宪”、“反战”、“反核”与“日中友好”的和平民主主义思潮势力消减, 其对抗和掣肘日益强大的右倾保守化潮流已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劳动组合、日教组等群众组织力量日趋薄弱。例如, 当前, 以“九条会”为中心坚持和平与民主、反对修改宪法为主流的社会运动仍持续进行着, 对民族保守主义势力构成一定的制约, 对政界的修宪势力也有一定的掣肘作用。但随着民族保守势力的增强以及“九条会”核心成员的相继离世, “九条会”的影响力正在不可避免地减弱。在中日关系领域, 以“日中七团体”为中心的对华友好团体活跃在中日民间交流的第一线, 发挥着促进中日友好的骨干作用。然而, 随着时间的流逝, 一些对华友好团体出现成员年龄老化、经费紧张、专职人员较少等问题, 有的甚至面临合并、更名或解散的命运。同时, 中日关系在领土问题、历史问题等方面出现诸多问题, 导致两国关系恶化, 普通日本民众对华感情趋冷, 出现“厌华”情绪。关心中日友好事业的日本年轻人数量锐减, 对华友好团体中年轻会员的人数也比较少, 中日交流活动中年轻人参与不够, 导致对华友好团体活力不足, 同时也制约了其将来的发展。

相比之下,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以来, 伴随着经济的长期萧条, 日本政治长期动荡, 思想领域民族保守主义蔓延。民族保守主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歪曲和美化日本侵略历史; 从安全保障角度对现行宪法体制进行讨论和修改的意识逐渐活跃; 宣传中国威胁论, 防范和限制中国。在保守主义思潮成为社会思潮主流、国民意识右倾化的趋势之下, 可以预见, 今后在政治、外交层面, 民族保守主义势力会更趋强大, 和平民主主义势力与强大的右倾势力的较量将迎来更为严峻的局面。2015 年 7 月 16 日, 安倍政府处心积虑推动的日本安全保障相关法案, 倚仗执政党在国会的议席数优势, 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得表决通过。这似乎表明, 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 大幅转变战后

^① 例如, 90 年代放弃对“PKO 法案”、“消费税法案”的反对立场, 在国旗国歌、非武装中立等问题上予以妥协。

以来“专守防卫”国防政策的步伐难以阻挡。为此，爱好和平的日本民众发起了多场声势浩大的反对新保安法案的抗议游行。在“安倍谈话”出笼之前，包括学者、教授、律师等在内的一批进步知识精英开展了积极的行动，有74名国际法学、历史学及国际政治学的学者发表了联合声明，以督促安倍正视日本侵略的历史。“安倍谈话”对“殖民统治”和“侵略”等措辞的提及，可以说是民族保守势力与和平反战势力博弈的结果。今后，和平反战运动能否对安倍内阁右倾化的国家战略起到有效的制约作用，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Japanese Social Movements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in the Post-war Era

Hu Peng

There have been various types of social movements in Japan in the seventy years of the post-war era, including the peace movement, the student movement, the labor movement, the anti-public hazard movement, the environmental movement, the consumers' movement, the women's movement, the movement for the pub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he movement for community building, etc. In terms of their relations with the authorities, all those social movement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hree different categories, namely confrontational, request-based and constructive. Those social movements share som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The leaders and main participants are the "newmiddle class". The movements are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social issues. The role of internet is growing in the movements. Since the 1990s, there has been a growing trend for Japanese social movements to shift from the confrontational type to the constructive type, and the social movements in ideological aspect are reflected as the clashes between the national conservatism and the pacifism and democracy.

戦後日本の社会運動の変遷と特徴

胡 澎

日本では、戦後70年の間、平和運動、労働運動、学生運動、反公害運動、消費者運動、環境保護運動、住民運動、女性運動、情報公開運動、まちづくり運動など、内容だけでなく、形式、特徴としても様々に異なる社会運動が起きている。これらのものは、政府との関係から、「対立型」、「要求型」、「建設型」という三つの類型に分けられ、いずれも行動主体の「新中間層」、社会問題との密接な関連性、インターネットの社会運動への浸透などの特徴を持っている。1990年代以来、社会運動は社会生活上のものであれば「対立型」から「建設型」へと転じ、イデオロギー上のものであれば、民族保守主義とポピュリズムという二大勢力の激しい対立を見せる、という点で注目される。

(责任编辑：林昶)